

八路军、新四军每人一套军服曾是奢望

“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部队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红军改编后，换成与国民革命军一样的军服。出于种种原因，当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没有笔挺帅气的军装，就连人均一件军服都曾是奢望。

“白皮”红心

改编后，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与国民党军相同。当时一名八路军正规部队士兵的标配装具主要包括军帽、军衣、鞋、绑腿、子弹带、手榴弹包、腰带和棉被等。

但换装一事在部队中引起很大抵触。在此之前，红军有自己的服装。1929年3月，红军在福建汀汀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看到，红军战士中有穿缴获的白军军服，有穿工人和农民服装的，还有穿长袍马褂的。为便于作战和管理，他决定统一服装，借助当时接收的当地军阀的一个军服厂，赶制了4000套军装。

在样式设计上，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确定新军服为灰蓝色布质；帽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列宁帽），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上衣为中山装式，衣前和衣侧有4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

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许多红军战士都对这款服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要换上之前死对头的制服，很多人想不通，情感上无法接受，甚至认为红五

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就是叛变革命。有些老同志回忆，当时跟战士做动员时，被战士逼问是不是要叛变投敌。有的干部向组织申请到地方工作，宁肯不扛枪也不换国民党的军服。

为此，朱德、贺龙、刘伯承、左权等很多中共高级将领都带头做起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刘伯承对129师的官兵说：“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说罢，带头脱下头上的红军帽。就这样，尽管情感上依旧别扭，八路军将士们还是先后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

穷有穷的好处

红军将士换上的军服，是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发放。抗战初期以实物形式发放，1938年改为货币化，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到经费后自行找裁缝店制作。数额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到1940年11月则几乎完全停供。

国民党当局的断供，对八路军影响并不算大，一来他们所发物资本来数量就不多，1937年，他们发来的军服约4.5万套，只够当时八路军8万兵力的一半用；二来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指望对方有多大方，他们发扬自身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靠自力更生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

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好的，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条件也比较好，部队每人每年发2套单衣，1至2年发1套棉衣；晋绥部队地处寒冷山区，供给比较差，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2-3年才能发一套。

据抗日老兵宋述分（当时是冀中军

区二十三团二营战士）回忆：“1939年快入冬时，我们才换上了棉衣，都是灰色军装，军装布都是手纺线织的，线很粗，布厚，但不结实。每个人一顶棉帽子，一套军装，还有棉大衣。这棉大衣没有全发，一个班里头只有三五个人有。没有棉大衣的，给发一条被子，这被子上有个领子，站岗放哨时把被子打开，系上带子披在身上防寒。不管怎样，这防寒的东西也能挺它一阵子。”条件较好的冀中军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艰苦。如120师兼晋绥军区1941年每10个人发1件大衣，1943年条件稍好，改为每5人发1件。

有时为了节省，还得延长服装使用期。129师曾规定：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皮衣，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此前规定，用裤面缝补，再穿一年，不得有任何借口……

不光是一线官兵，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补了又补的军装。后来警卫员数了数，大大小小补丁一共有18块。正因为这样，八路军被敌人称为“穷八路”“土八路”。不过，穷也有穷的好处。1944年，山东东平的日伪军企图假扮成八路军搞偷袭。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八路灰军装出发了，结果被“土八路”一下子就识破了，这么整齐的衣服，八路军哪这么富有啊！

军服的来源

除了国民政府供给外，各根据地解决军装短缺的问题，主要有下面几种途径。

一种是立足当地，自行筹措。1937年底，为解决部队过冬问题，120师由政委关向应亲自带队到山西临县，找当地商会帮助，借到棉衣1万套、棉被7000条、棉鞋2000双；115师独立团则通过自行购买棉花、布匹，再找

当地裁缝店突击制作，解决棉衣问题。

第二种是军队被服厂生产。各根据地基本都建有自己的被服厂、纺织厂和鞋厂，承担被服装具的生产任务。在国民党当局减少乃至断绝装备供应后，八路军被服厂得到较快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军需工厂已经从1939年的不到80个，增长到400多个，职工有4万多人。

第三是根据地政府支持。以军鞋为例，军服大多能靠被服厂生产，军鞋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靠纯手工制作。这项工作主要靠广大妇女来承担。当时各根据地广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成立了“妇女效国会”。在这个组织的动员下，广大妇女积极参与，为一线部队制作军鞋。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的戎冠秀，就是当时的优秀代表。

第四是海外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路军经由香港、南洋等地获得一定的物资供应，如棉背心、皮大衣、毛毯等。1938年，新四军利用该军干部陈子谷回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募得国币6万元，部分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最后是战场缴获。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缴获了大批日军被装和其他军用物资。只有一样东西相对充裕，那就是军帽。事实上，很多战士在进入部队时，一开始只发给一个军帽和一个臂章，主要原因大概是军帽所需布料最少，而且最为醒目。当时不少根据地的八路军在奖励配合作战有功劳的地方部队时，就是以军帽为奖品。所以，头戴八路帽，腰间系皮带，敞开衣襟，腰里插着驳壳枪，这就是当时典型的八路军地方干部形象。

据《国家人文历史》潘砌/文

小泽征尔：“半个中国人”

2月6日，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去世，终年88岁。他曾师从20世纪3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是闯入西方古典乐坛少有的东方面孔。他与印度的祖宾·梅塔和新加坡的朱辉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

“非常不可思议，我出生在中国沈阳，有时我认为自己是半个中国人。”1976年至今，小泽征尔是来访中国次数最多、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指挥家。

20世纪30年代初，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在中国东北地区当牙医。1935年，小泽征尔（以下简称小泽）出生在中国沈阳。小泽出生第二年，他们便举家迁到了北京，一直居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才回到日本东京。

小泽学音乐起步比较晚，5岁时，母亲送了他一个手风琴作为圣诞礼物，小泽才第一次接触音乐。而开始学钢琴，则是在他10岁的时候。然而，少年时期的小泽打了两年英式橄榄球，并在球赛中折断过两根手指，所以只能断了做钢琴家的想法，专心学指挥。

1952年，小泽进入音乐教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斋藤秀雄参与开办的桐朋学园音乐系。几年后，小泽从桐朋学园毕业时，已是一位颇具才华的青年指挥家了。但是，拥有更高志向的小泽并未满足已取得的成绩，20多岁时就乘上装载摩托车的货轮只身赴法国学习音乐。1959年，小泽参加贝桑松国

际指挥比赛一举夺冠，一夜之间成了当时欧洲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1960年，经乐坛大师、比赛评委之一的查理·明希推荐，小泽参加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年夏天在美国麻省举办的坦格伍德乐展。以此为契机，1961年，小泽被选拔出任了伯恩斯坦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而且还在卡拉扬的弟子选拔赛中胜出。小泽因此有幸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指挥界两位最伟大的指挥家的熏陶，可谓是古典乐界的传奇。

但学成归国的小泽却遭到了日本交响乐团成员的抵制。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从1973年开始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小泽跻身世界最优秀的指挥家行列。在波士顿交响乐团近30年的指挥生涯中，小泽创造了古典乐坛的奇迹，使乐团成为国际上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一。

出生在沈阳的小泽曾多次访问中国，有很强的中国情结。在母亲去世后，小泽选择将其一部分骨灰埋在北京胡同的院子里，那是他儿时的家。小泽曾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用中文说“新年好”向全世界表示问候；也曾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过音乐会；他创建的“小泽征尔音乐塾”曾在中国招生并将他们带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据《新民周刊》杨维格/文

